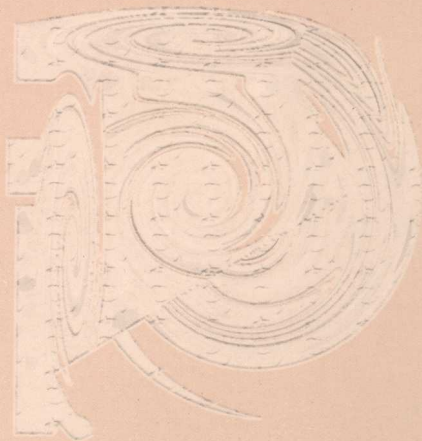


吴文虎 / 著

拐点集

—— 吴文虎文选

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观点 / 信息——新闻学研究的最新课题 / 对西方新闻报道真实性问题的评析 / 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 / 培养港、澳新闻人才的几点认识 / 传播学理论构架初探 / 对「三论」在传播学中的地位评析 /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 传播理论的大众文化转向 / 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 / 播客社会文本的意义解读 / 全球化与我国大众传媒的整合 / 广东报业竞争的态势与未来 / 都市报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空间 / 市场报怎样进入大市场 / 拓展传播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评《媒介建筑：传播学对建筑设计启示》 / 《百分百咖啡》自序



福建人民出版社

拐点集

—— 吴文虎文选

吴文虎 /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拐点集:吴文虎文选/吴文虎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1

(暨南新闻传播学人丛书)

ISBN 978-7-211-05395-7

I. 拐… II. 吴… III. 新闻学:传播学一文集

IV. 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164 号

拐点集——吴文虎文选

GUAI DIANJI——WU WENHU WENXUAN

吴文虎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富兴路 15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7.125 印张 1 插页 406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 978-7-211-05395-7/定价: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一

宁树藩

被“文化大革命”“革”了“命”而气息奄奄的中国新闻教育，真正恢复生机步入蓬勃发展，恐怕要从1983年算起。就在那一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谋划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及其改革，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绝无仅有的。在此前后，一批“文化大革命”前的原新闻院系毕业生，在年过或年近“不惑”之时，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岗位向各个大学汇聚，重新捡起荒废多年的“专业”，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薪继火传，承担起复兴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之大任。现在的年青教师和学生，已经是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艰辛，更不必说体验了。不过有一点是大家共睹的，即：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之下，中国的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面貌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而有了今天的繁荣景象。当然，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程也由此得以根本改变。吴文虎教授就是这一批人中的一员。他把自己的文选名之为“拐点”，自有深意存焉。

所以，我是饶有兴趣地把吴教授的文选首先作为历史来读的。就全书的内容看，若书评不算，共分为五部分：新闻理论、传播理论、新闻实务、传播实务及媒介经济。顺着时间线索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985年前的文章都是属新闻理论方面的，1986年后开始涉足传播理论，90年代中期则又扩展到媒介经济。这样的学术版图，所标示的是吴教授个人的学术足迹，但我更愿

意把它看成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个路线图。我们，以及像吴教授这个年纪的人都很清楚，在改革开放后，也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只有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知识的介绍，到了 1985 年后才陆陆续续出现在刊物上。至于媒介经济的问题，虽然从渊源上也许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报纸实行企业管理），但这一方针真正落到实处并由此使媒介成为一个产业，则是在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于此不难看出，吴教授个人学术兴趣的迁移，其实也就是中国整个新闻传播实践和研究历史变化的轨迹。这本文选，实在是这一历史缩影的凝结，并因此而显示出其自身的重要价值。

一提历史，人们就不由自主和过去或者陈旧联系在一起。其实，任何一个历史都有过自己的“现在”甚至时髦。比如我们常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以此来证明新闻对于未来的价值，这固然没错。不过，切不可由此把内在所包含的明天的历史曾经是今天的新闻这一意义给忽略掉了。吴教授文选中有一篇谈历史的文章，名为“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其中，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被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7 年；1957 年的反右到 1978 年；第三阶段则是整个 80 年代。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三个阶段划分如何，而是文章中对最后一个阶段的概括：“首先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闻理论的探讨从新闻的 ABC 开始，一切都给‘四人帮’搞乱了，得从头从最基本的重新进行研讨。如对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的探讨，争论了两三年，很有意义。后来又提出宣传价值的问题。再就是新闻真实性的问题。新闻必须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后来有人提出本质真实论，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还有报纸职能（功能）的转变，也是 ABC 的问题。过去是强化宣传的功能，后来才提出服务的功能、娱乐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现在让我

们看一看文选中“新闻理论”部分中的那些文章，如《似是而非的“本质真实”论》、《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观点》、《信息——新闻学研究的最新课题》等，几乎都是这第三阶段的热门论题。关于“信息”的讨论，我需稍微饶舌几句。吴教授所谓的“服务、娱乐”等功能，实际上是和信息概念的引进和使用分不开的，是“信息”概念为后来关于报纸服务、娱乐功能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武器。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信息观念及把传递信息作为新闻事业的一种功能，实际上是对“一切新闻都是宣传”说法的否定。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到，吴教授的这些新闻理论文章，同时也包括其他部分的内容，无论写在什么时期，都是当时甚至现在（比如文选中的“全球化”、“社会变革与新闻传播理念”）的学术热点，是其时乃至当前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总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可以这样说，在《拐点集——吴文虎文选》中，看不到一篇漠视现实、闭门造车的东西。因此，文选是历史的，也是新近的，它充溢着吴文虎教授敏感、求新、紧跟现实和开放进取的治学态度。

这就不奇怪，他文选中的很多论题，都是走在前面：最早介绍传播学的学者中有他；他是最早一批介入媒介经济的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就开始讨论符号学和广告，并且后来专门就此做了研究，这在我感觉上也是一个先行者。至于在2002年就着眼于《传播理论研究中的大众文化转向》，内中涉及“伯明翰”、阿尔图塞，以及后现代，在新闻传播领域，同样是不落后的。最近，他又在思考如何改进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这种趋时趋新、敢为人先，而且所涉及的内容之广，所吸取的理论之多，在他的同辈人中是很少见的。众所周知，人上了年纪，不免要保守，在学术上极容易固守自己所擅长熟悉的小块地盘而冷眼藐视一切，话说着说着就三转两转又回到自己的思路。吴文虎教授始终能保持

这么一种年轻活力，始终存有那么一种好学探索的兴趣，对新的理论、新的问题，始终具有一种兴奋和敏感，实在是十分难得。当然，文如其人，吴文虎教授的这些特点可能和他的个性有关。凡与之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无论是穿着打扮、聊天的话题还是使用的物件，他从来没有跟不上时代的时候。因此，他和年轻人特别处得来，很快就能找到许多共同的兴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书总是要一本本看的，理论也是要一点点了解的，吴文虎教授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还能了解、掌握那么多新的东西，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趋时文章的一个最大缺陷，就是容易浮泛，变成俗称的应景文章。吴文虎教授的文章虽然不能说每篇都厚实，但几乎每一篇都是用心写就，不人云亦云。因此在开门见山、快人快语中，总是能一针见血给人启发。随便举几例：在《从“读者今天来电”谈新闻改革》中，他提出要满足读者需要，为读者服务；在《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观点》中，强调不能把宣传价值、新闻传播效果和新闻价值相混淆；呼吁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新闻观念要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行（《社会变革与新闻传播理念的演变》）；提倡着力于研究和发现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然后再聚沙成塔，尝试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理论（《社会学与传播学的中观研究》）；建议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要形成一定规模的跨学科研究，改变目前单一的新闻学科背景状况，否则，本来就是由多学科构成的传播学，就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这些发表于十几甚至二十几年前的观点，即便在今天，仍然还未失去其积极意义。

最近见到吴教授，言谈中得知他正在继续探讨如何改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问题，并为此已经看了不少书，做了不少的案头工作，这让我十分欣喜。我在1982年写过一篇文章，强调中国新

闻史的研究和编写要以新闻事业为主线；在 1997 年的一个访谈中，进一步提出要强化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吴教授的一些想法，恰与我不谋而合。我急切盼望能早点看到他后续研究的成果。借此我倒想到，吴文虎教授的同辈人，亦即在 1983 年前后创建各高校新闻教育的那一代，基本都已退休。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拥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不必有功利之念，可以安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倘都像吴教授那样，继续努力写一点自己喜欢而且有点意思的文章，那么，拐点之后的曲线，仍然会是高开高走。这无论是于其个人还是于中国新闻传播学术，无疑都是一件大幸事。

序 二

吴予敏

今年春节期间，文虎老师将他编好的论文集《拐点集——吴文虎文选》（以下简称《拐点集》）传给我。这是他 20 多年积累下来的新闻传播学论文汇集，记录着他在这个变化多端而又充满挑战的领域里的探索足迹。可是，听到他要我来作一篇序言，我着实意外而惶恐起来。一来，我本人长期工作的领域不在新闻学，又缺少新闻实践经验，多少有点心虚；二来，我和文虎老师是忘年的朋友，他所经历的、思考的、承受的和为之奋斗的东西，在我来说，还需要再多多接近，体会揣摩。藐予小子，何敢置一辞？这么一想，犹如芒刺在背。然而，文虎老师全然不在意这些，这也是他对待后辈宽厚和热诚的性情所至。

文虎老师和我的缘分，最初应该是一种地缘。我们都在西北地区工作生活了多年，后来又都到了岭南地区，各自主持过暨南大学和深圳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而文虎老师还比我更早些来到深圳大学，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协助我们创办传播学专业，并开坛授课。对于这两所学校的新闻传播学科，他都有创建的功劳。

在年长的朋友中，文虎老师是从里到外都透着激情、活力和智慧。他的思维与情感，时时显得比年轻人还要年轻。尤其是那种不带岁月风尘的锐气和直率，待人如此，对待他所热爱的学问和事业更是如此。

这本取名为“拐点”的文集，似颇有深意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拐点呢？倘若我们没有经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反右和大跃进，没有经历 60 年代的大饥荒和社教，没有经历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经历其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们是不能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国家和社会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拐点”就是历史的转折，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新闻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更能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幻。就我个人的经历及有限的观察而言，新闻传播事业犹如一个巨大的无边的漩涡。少不更事者，多半倾慕而趋之若鹜；历经沧桑者，多半审慎避之唯恐不及。自古以来，就有“防川”之说，滔滔洪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拐点集》中汇集的文字，出自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学者之手，却绝无奉承应命之作、八面玲珑之语、声色俱厉的卫道之言，有的只是严肃的思考、敏锐的分析和大胆的直言。其中很多论述，不仅在 10 多年前是振聋发聩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是显出真知灼见。

这本文集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紧密追随时代变迁所做的比较深邃的理论思考。请看他在 1981 年这样论述“新闻真实”：“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要求新闻必须揭示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客观上也是不存在的。比如，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它们的本质至今还是个谜。作为新闻，也只能是现象甚至可能是假象的报道。这种情况，在新闻中并不少见。有些事实曾一度被认为是假象，却可能是真相；有些被确认为真相的，却又可能是假象。其原因在于认识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不可能一次完成，而事物本质的揭示，也绝非一蹴而就。”“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只能是要求新闻如实反映客观事实。这种报道是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是有立场的。新闻真实性不必要也不可能纳

入‘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反映本质的真实’等诸如此类的唯心主义的公式。”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最高指示到民间话语中都流行着一种“辩证法”表述。所谓事物有“本质的真实”和“现象的真实”之分。凡是不符合最高指示断言的，即使是明明白白的真实，也会被当做“现象的真实”而被有意忽略、掩盖、摒弃。这就是新闻界的“文革文风”的思想根源，是完全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观念。文虎老师将实践标准讨论的理论成果与对新闻真实论的思考联系起来，从唯物主义观念出发，揭露了冒充辩证法的“诡辩论”。这样的论述，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的教训是，将社会现象分为本质真实和现象真实，不过是用武断的政治概念规范社会事实，为新闻事业制定观念上的“紧箍咒”；将新闻直接当作“真理的传声筒”，往往不过是“权力的传声筒”的另一种冠冕堂皇的表述罢了，从本质上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从而违背了新闻的党性原则。新闻活动在本质上是人们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基本性质。文虎老师所表述的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念，这就是将新闻看做人类社会特别是人民群众的信息交流的实践活动。在这个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直接呈现生活事实，也就是客观真实。客观报道，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新闻业的底线伦理。否则，我们就会重新陷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七分还是三分”之类的诡辩论，造成千报一辞，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新闻有没有共同规律，西方新闻学有没有可资借鉴之处，也是有争论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文虎老师就主张客观对待西方新闻学。他指出，西方新闻学对真实性原则的阐述尽管由于出发点不同，受到世界观和阶级偏见的影响，但其立论基本是正确的，观

点也是鲜明的。他们强调的是新闻必须真实这个基本点，对新闻失实则采取谴责、批评的态度，而不是公开宣扬假报道的合理性，鼓吹和引导失实报道的泛滥。他们对贯彻真实性提出的办法和措施不少也是可行的、现实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新闻事业的总的成就的一部分，也是当今世界所有新闻工作者需要共同遵循的行业的普遍伦理。不能用简单的政治标签加以否定。这种看法，对于廓清新闻学的“左”的观点是十分中肯的。他的建立在新闻真实性原则基础上的“新闻价值”观念，我认为也非常精辟。

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特点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新闻的党性原则的内涵。新闻舆论工具历来是政党借以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同时，在社会民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人民主权也必须充分体现为能够合法地利用新闻舆论工具交流信息，表达政治和社会意愿。社会的普遍和谐是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开放的公共空间为基本条件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她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发生了深刻改变，从领导阶级斗争转变为领导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一方面，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人民的贴心人和代言人；另一方面，也要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声音。固然，无产阶级政党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这并不等于说，各级党组织的任何决定都直接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声音。人民群众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有不尽相同的利益诉求。而党的组织是高度统一的，有着政治使命和意志，有着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组织。党的声音不是要涵盖所有的社会声音，而是要引领社会意志的走向。这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观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正如新闻报道立足于客观真实一样，新闻媒体也必须立足于广大人民的社

会生活实际，直接地反映社会动向和人民的呼声。收在这本文集中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现实意义》、《解决好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认识问题》等几篇文章，反映了文虎老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和新闻的党性原则观念。在《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观点》和《社会变革与新闻传播理念的演变》等文章中，坚持了普世新闻价值观和人民性。他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党所制定的新闻政策都以人民利益为依据，因此，自觉以党的新闻政策为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完全摒弃新闻价值观念，用新闻政策取代新闻价值行不行呢？也不行。从以往情况来看，无视新闻价值已经给实际工作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是应该总结和记取的。”“新闻价值是事实所包含着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种种特殊素质的总和。”他正确指出，用“新闻政策”、“宣传价值”取代“新闻价值”是一种观念谬误，对于新闻事业及实践会带来危害，他强调新闻价值的客观性、科学性、人民性和专业性的统一。这样的理论分辨，有助于将我国新闻从左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基本的新闻尊严和信誉，焕发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文虎老师在 80 年代中期到复校不久的暨南大学新闻系任教，他带着长期以来关于新闻事业发展问题的思索，深入研究在广东地区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意义。收在这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关于广东地区新闻改革的经验总结，以及由此上升为新闻传播理论的思考。我以为文虎老师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中，“市场”和“平民化”是两个突出的关键词。他的很多论述，都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事业如何发展的大问题。这里面有传媒生态和市场竞争问题、舆论导向与新闻趣味性问题、地区媒体市场定位问题、媒体与市

场及受众的关系问题、传媒经济和新闻体制改革问题、进入WTO以后如何应对媒体市场挑战的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文虎老师思维之开阔，感触之敏锐。特别要说的是，文虎老师的理论思考，始终和广东地区的新闻改革实践紧密结合。例如，他在广东广播改革的十年经验的总结文章中，对于在电视媒体强势时代的广播改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准确指出，广东地区广播媒体改革的成功证明了彻底告别“假大空”的、旧的广播编辑和播音方式，贴近平民，贴近市场，着力发掘媒体特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从改革经验中总结的四点启示，即广播的多渠道传播网络和传播内容的一体化、广播新闻的时效性、广播模式向人际传播模式靠近、广播媒介最能发挥受众参与的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等，都是新闻传播学理论的成功运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新闻媒体的各项改革在全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不时向人们提出问题。媒体的平民意识、平民风格、本土化和地方特色不仅涉及媒体与老百姓的关系，也涉及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跨国传媒集团首先在广东落地以后，不少人为中国传媒的市场前景担忧。文虎老师则从广东地区的文化传播传统和市场格局中看到了本土传媒的生机与活力。岭南近代文化，近一百年来，是推动中国民主革命，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崛起，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最能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昔日的边陲文化，两次成为文化主导，向内陆辐射，促使中国文化发生整体性的变迁。他主张从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城市化的社会变迁以及大众文化生活的根基中发掘新闻传播的原料。他还指出，过去我们的主流媒体靠的是行政的力量建立权威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流媒体不是自封的，是社会的一种客观评价。如果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得不到社会认同，最多也

只是垄断媒体”。主流媒体要反映和报道所在国家、地区的重大事件、基本走势和主要问题，还应当代表主流群体的民意。他对于新闻体制改革中迅速出现的媒体集团现象提出中肯的看法，指出，媒体集团的集中化的程度不能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媒体。主流媒体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并非行政力量可以左右。

市场经济的原则，并不等于就是单纯的经济利益原则。这里面还有民主化的原则、公平性和公正性的原则。文虎老师对此有非常准确的把握，这是他在讨论媒体市场经济的时候，比许多纯经济观点或者营销观点高明很多的地方。他的多篇文章讨论了新闻监督、新闻舆论调控、新闻平民化。平民化和市场认同是问题的一体两面。什么是“平民化”？文虎老师认为“至少有三点：一是平民化的视角。要改变以往有的媒体采取向上的仰角，尽量把头抬高，唯上、唯书、不唯实；对下则取俯角，对老百姓指手画脚，是一种说教式的宣传。平民式的视角则是平视，不论采、写、编、摄还是评论，都应和人民大众平起平坐，尽可能缩短彼此的距离。关键是采取平等的态度，客观、公正和商量、沟通去求同存异。二是平民化的报道。要用主要篇幅和版面（时段和栏目）反映群众身边的事、关心的事，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诉求。民生新闻要报道，但也不能忽视政治民主的进程。同时，要善于分清琐碎之事和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所谓‘小事’，以及琐事背后带来的思考”。“三是平民化的表现形式，要反对千篇一律的官式口吻，提倡有个性的为受众喜闻乐见的做派。标题口语化，图文并重，加强广播电视节目的娱乐性等，这些都是业界和学界要探索的内容。”这些论述，清晰生动地阐发了党中央所提倡的新闻“三贴近”原则。

文虎老师始终关注广东地区的新闻改革的实践经验，及时总结成功的做法，将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他善于抓住紧迫的

问题，扣住症结，揭示事业发展的趋势；特别可贵的是，他毫不讳言在突发新闻报道中显现的我国新闻体制和新闻管理的问题，从事实教训中提出新闻改革的理论主张。我国非典型肺炎疫情从2004年1月起在广东省开始出现，后扩散至华北等部分地区。在这一非常时期，在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有力指挥下，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奋力抗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传播制度，保证了信息的公开性，新闻报道的透明化，使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国际社会大大地靠近了一步。文虎老师就此事件的新闻报道的经验教训及时作了理论总结。他指出，“过去我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看来，在信息时代，防民之口是防不住的。当然，这一事件突如其来，令人难以防备，对情况估计不足和初期处置不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事件的确反映出我们对传播机制的认识不足，缺乏处理危机事件传播的经验，致使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统计不准确，反应不快，应急准备不足等，在重大疫情面前显得比较被动。因此，从总结经验教训来看，今后我们的新闻传媒及其传播方式（包括网络传播在内），都应纳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之中。”他提出，新闻传媒“应当强化本身具有的环境监测的预警功能，配合有关部门及时向广大公众传递准确、真实的信息。”“在政府、传媒和公众这三者的关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此，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对环境监测结果和行政活动的透明度。”“公民的知情权能够制约某些官员的信息垄断行为，实现有效监督。”这些论述显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从新时期以来有了极为迅速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传播学的崛起。据我了解，这个学科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最初引进的时候，其价值还远不是人所共识的。当时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就是将新闻学和传播学看做两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从而将传播学直接定义为具有某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罪”的伪科学。后来得益于总体的改革开放的思想氛围，也多少得益于当时新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科学方法论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影响，多少得益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复苏，而淡化了传播学的“原罪”身份。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文虎老师是老一辈新闻学者中较早肯定传播学的学科价值，提出传播学的学科理论要点和本土化前景的。我们在文集中看到他在 1985 年发表的《信息——新闻学研究的最新课题》一文，实际上表达的正是传播学的知识观念。收在这本论文集中的“传学本土化”的论文专辑，以及在关于传播学著作的书评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学术思考。

在这部文集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关系到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这既是文虎老师工作历程的记录，也是他对于新一代新闻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传授。文虎老师的学科建设和教育理念，我以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和高等教育的指导作用；第二，他十分重视新闻传播理论走出国门，与世界对话，同时也非常重视将传播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第三，他十分重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应用型社会科学，因此必须和哲学社会科学相贯通；第四，他十分重视培育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生力军，特别是那些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责任感的中青年学者，鼓励他们的创新之作。现在活跃在新闻传播学科前沿地带的喻国明、郭庆光、李彬、张咏华等都曾得到他的热情的支持，他像对待自己的著作那样欣喜地对待年轻学者成果的问世。他对于青年学者不仅有鼓励，也有忠告。他这样说，对“传